

探訪紫砂「槍手」



如是我見
張明強

紫砂藝術與經濟時代的不期而遇，使得人們難逃金錢的誘惑，從「洛陽紙貴」到「宜興泥貴」，相隔千年，相距千里，且完全不是同一行業，折射出紫砂文化產業的變化，在宜興紫砂藝術行業仿古成

風的當下，優質的宜興黃龍山原礦紫砂泥料，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挖出的礦源成為了十分稀缺的資源，有人以黃金般的交割價格買賣，論克交易。

這幾年回宜興的時間少了，但自媒體發達，一些紫砂圈內的事情倒沒有少知道，前些天，一位業內行家朋友告訴我，現在大部分掏錢買優質老泥的人，基本是為了製作高仿高價位的名人壺。為了一睹這些「槍手」的廬山真面目，我們拿了一坨舊藏的老砂紫泥，一起去探訪其中一位。

我們在陶瓷城轉了幾個彎找到他的工作室，門緊鎖着，於是，朋友打電話給他，電話那頭說十五分鐘到，不是多時，一輛汽車停在了門口，下來的正是這位槍手，我們說明來意，他讓我們坐下，我說一個朋友想讓我找一把有意思的紫砂壺，複製一把清代陳鳴遠的束柴三友壺，我拿出原作與那坨老砂紫泥，他看了看泥，用手指驗了驗砂笑道：「如果我沒看錯，這泥料應該更接近民國晚期出產的原礦紫砂泥，做乾隆年間的恐過不了關，這樣，仿製一把民國高手裴石民的吧……」

一個月後，我單獨去取壺，不禁一陣心跳——那是一把民國紫砂聖手裴石民的代表

作，造型氣度韻律沒有二致，從砂料到成型手法再到燒成工藝。我說：「您的手藝這麼好，為什麼不搞原創呢？」他像是一怔，定定神看着我道：「說這樣話的人還真不多，其實很簡單，您來我這裏，不

是衝着我的名字吧。」年輕人順手抄起一把紫砂壺湊近唇邊深深地喝了一口，我聞出來那裏面裝的不是茶，是酒。

他又說，現在紫砂行業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創作藝術的時代，紫砂藝人的價值大多只能讓那些大師們、投資人認定，更似是資本的遊戲。「這就是現實，對吧？我做一百把壺，還不如人家做一把壺，變不了幾個錢，還不如做幾把高端的仿品掙點錢。高工、大師搶佔了市場先機，輪到我們的機會不多了，現在做代工，作高仿，只要有門路，高仿壺還要分幾種檔次，價格不一樣。」

這些話聽來令人費解，按理說，仿冒別人作品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為什麼從紫砂槍手中說出竟有幾分坦然？這也多少說明，紫砂藝術行業在傳統意識上的喪失，這幾年大量資本湧入紫砂行業，炒作成風，行業內真正有實力的不出名，出了名的沒實力，於是，代工就普遍起來，假冒價品就開始氾濫成災了。

我一直告訴那些收藏投資家們，資本的溫床上培育不出優秀的紫砂藝術家，在當前浮躁的紫砂生態環境下，用錢買來的頭銜、名譽，也許可以風光一時，但我相信時間與歲月一定會檢出作品真實藝術水準與市場價值。



自由談
朱昌文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企業對推動社會的持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筆者不久前出席《鏡報》月刊主辦的「企業社會責任講座暨交流會」，與會者甚眾。聽了幾位企業代表、學者及專業人士的演講，講述他們在推動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作出了什麼貢獻，結合最近中央財經委員會研討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共富」已成為輿論焦點，引起全港各界人士的深入思考。

香港與內地雖是奉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但共同富裕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理念相近，背後都蘊含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內涵，致力改變貧富懸殊的現狀。「共富」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廣大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鬥，這是根本途徑，要鼓勵勤勞致富，創新致富，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先富帶後富，不搞「殺富濟貧」。

《鏡報》「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委員會主席徐世和指出，近二十年來，業界及投資者越來越認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全球共識。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大家都注重社會及自然資本，包括企業在環境、社會、管治的決策方向。《鏡報》舉辦「企業社會責任獎」評選活動，旨在建立交流平台，讓參與企業互相借鑒，履行環境、社會、管治的企業社會責任，提升價值及形象，適應二十一世紀的營商環境，並達至企業與社會同步發展，推動社會和諧、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達至多贏局面。

企業經營者如何理解和履行社會責任？各有不同看法和做法，未必趨於一致。筆者欣賞和認同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的觀點，他曾當第一屆「傑出社會責任獎」評委，當年他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概括為：「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他認為，一個良心企業除了賺取金錢之外，還須做到拉近與基層市民、弱勢社群的距離，為勞方與資方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與「共富」

共建和諧社會。他強調，一家履行好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與股東、管理層、員工以及社會等各個層面均保持平衡的關係，特別要積極推動社會幫助弱勢社群。

企業社會責任是任何規模的公司必須履行的，企業需與客戶、僱員、投資者、環境及社會負責，特別對員工的關愛，包括適當提高工資和福利保障、醫療保障以對社會的公益慈善捐款等，都是企業應當重視和切實履行的責任。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由來已久，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表的「二〇二一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六十四個經濟體中排行第四十八，屬於貧富懸殊程度最高的三分之一地區。港府去年底發布的「二〇一九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本港貧窮人口有近一百一十萬，創下新高。

香港如想實現良政善治，市民安居樂業，政府必須從改善民生入手，切實解決基層迫切的住房問題，協同工商企業和各界的努力，從根源上改變貧富懸殊現狀，朝共同富裕的道路邁進。

回憶錄：在德國波茨坦高等可持續能源研究院的經歷



人生在線
陳清泉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Carlo Rubbia。我邀請他於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訪問香港，在我主持的國際電機會議IC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作主旨演講。隨後，他邀請我到德國波茨坦的高等可持續發展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ustainability Studies, IASS) 任高級研究員。該研究院是根據在波茨坦舉行的諾獎得主論壇的建議，由德國總理默克爾批准於二〇一〇年成立的。第一任執行院長是德國前環保部長、聯合國副秘書長 (一九九八至二〇〇六) Klaus Töpfer，首任科學院長是Carlo Rubbia (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五)。按照慣例，IASS高級研究員的聘期至少為一年。而我各項事務頗為繁重，時間上難以保證。但他很看重我，願意為我打破常規。他說：「對你來說，你可以隨時來，也可以隨時走。」該研究院坐落在風景優美的波茨坦深湖 (Tiefer See) 和明亮湖 (Heiliger See) 之間，行政樓前面不遠是深湖，從後樓研究院樓步行十幾分鐘就到明亮湖風景區。

於是，我從二〇一二年直到二〇一四年，每年暑期約兩個多月到波茨坦做研究。波茨坦在柏林的東邊，和柏林只一河之隔，地屬前東德版圖，這條河是冷戰時期東德和西德的分界線，也是冷戰時期東德和西德交換俘虜的地方，時至今日河上面的橋面上還刻有當時東德和西德的分界線。

研究院所在的城市波茨坦是二戰剛結束時，美國、英國、蘇聯首腦舉行波茨坦會議瓜分世界的地方。波茨坦會議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到八月二日，美、英、蘇三國首腦杜魯門、邱吉爾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後是新任首相艾德禮) 和斯大林舉行戰時第三次會晤，史稱「波茨坦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

重大意義，並就戰後許多重大問題達成了協議，從而確立了戰後世界的格局。會址在明亮湖邊的塞西林宮，是波茨坦許多王宮中較小但是很秀麗的地方。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德皇威廉二世為他的長子——威廉皇太子在波茨坦北部建造了一座仿英國鄉間別墅風格的宮殿，並以太子妃塞西林公主的名字命名，稱塞西林宮或稱塞西林霍夫宮。當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工程停頓，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建成，耗資約一百五十萬馬克。我在波茨坦IASS研究院附近散步時還看到當時斯大林、邱吉爾和杜魯門的住處，後者當地人稱之為小白宮。

Carlo Rubbia的助理Delia Salmieri告訴我，他們對我的到來很重視，和後勤部打了招呼，給我安排了最好的住宿，住在研究院的行政樓頂層套間。這是一座歷史建築，是普魯士王朝時期的總司令官邸，有很大的後花園，有好些古樹，像小森林。我的套間還有露台，周日時，坐在露台舒適的椅子上，觀賞古老的樹木和鮮艷的花草，品嚐德國紅酒，欣賞古典音樂，激發創新思維。

我在該研究院研究的課題是能源、信息和人的行為的內在聯繫，並在二〇一二年發表了第一篇文章。我很幸運，二〇一四年任



德國波茨坦高等可持續發展研究院。

作者供圖

中國中華集團新能源領域首席顧問及北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院國際學術委員會委員後，認識周友博士及其團隊，將我的研究繼續深入，並培養了優秀的博士後張丁，撰寫了理論基礎。我提出，通過四網 (能源網、信息網、交通網、人文網)，四流 (能源流、信息流、物資流、價值流) 的融合，將能源革命、信息革命、汽車 (出行) 革命聯動起來，產生最大的經濟和生態效果。現在我們將研究成果寫成白皮書。該白皮書從哲學、科學與工程的角度，闡明能源與信息深度融合的意義，從哲學上的綜合思維，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到科學上的能源、信息和人的行為的互相聯繫，找出將無用的能源轉換為有用能源的規律；再到工程上的採用邊緣雲結構和人工智能開發能源操作系統。其中的方法是能源流、信息流、物質流與價值流的融合；其中的路徑是能源網、信息網、交通網與人文網的融合。通過描述數據、算法、算力、平台與生態五個基本要素的融合手段，以智慧工業、智慧能源、智慧交通與智慧城市為應用需求說明了四網四流產業發展的技術戰略與框架。希望此白皮書能為發改委的新基建的實施產生影響，促進能源產業和信息產業的戰略合作。

（一）

江迅先生千古

籍貫番禺風華正茂黃浦江邊文學尋夢者，移民香港筆鋒如劍獅山上社稷點燈人。

廣東珠海丘樹宏敬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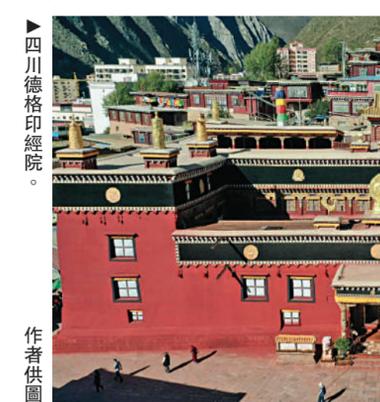
八方天地 任我縱橫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今年九月十八日筆者人還在烏魯木齊時，因為港人身份未能在網上訂由新疆直飛西藏的機票 (網站顯示，訂任何着陸西藏機場的航班，必須用內地身份證或戶口本號碼，筆者沒有這些證件)，曾去找過烏市內的航空公司銷售點，但已搬了。當晚和平生認識的第一位達幹爾族朋友秦老師吃餃子。席間，筆者詢問曾在邊疆行走多年，拍攝我國軍人不畏艱苦、保衛邊疆事跡的秦老師，是否能由三一八國道 (川藏南線) 進藏，直奔阿里獅泉河鎮，再由三一七國道 (川藏北線) 出藏？當秦老師知道筆者擬用由租車App租來的寶沃越野車後，便說「可以」。

有了秦老師的鼓勵，筆者毅然走這個出入西藏的「大圓圈」，圓平生自駕遊阿里之夢。九月二十七日到了拉薩便在由湖南到西藏做生意的周先生陪同下，去申請邊防證後，之後便在九月二十八日持意圖回林芝市的墨脫縣。墨脫毗鄰印度，是我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縣 (二〇〇九年才勉強通路，二〇一三年後才能全年通行，迄今為止，為避免山路狹窄而堵車，還是要雙日進，單日出)。去完墨脫回拉薩過國慶節，之後便直奔阿里，一直跑到日土縣的班公湖，之後便

由川藏北線 (三一七國道) 經改則縣、尼瑪縣、那曲市、昌都市再出藏，經四川藏區的德格 (其藏傳佛教印經院聞名於世)、甘孜、卓克基土司官寨，再回到成都；完成了行程達九千一百七十四公里的西藏之行「大圓圈」。這次繞行南北川藏線，由構想到落實，全因為秦老師的鼓勵。在此向他表示衷心感謝，也感謝深圳衛視的記者為筆者隔空介紹了秦老師，在此一併致謝。撰寫此文時，筆者已人在成都休整，十月十六日去西



四川德格印經院。

作者供圖

寧會友，再去兩個地方，作為本遊記的續篇，之後正式收筆。

四川藏區有三處可能是多數港人不大注意但很值得來的地方。由西至東，第一個是德格，這是金沙江畔的一個縣城，而金沙江則是川藏分界線。據網上資料，德格縣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這裏有一處古老、吉祥聚慧的寶地，那就是被稱為「雪山下璀璨的明珠」的「德格印經院」，藏語稱：「德格巴宮」 (Tib. Dege Parkhang)。至今，

它奇跡般地完整保存着二十二萬餘塊木刻古印版，這不僅是藏族，也是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產。

第二個是甘孜，一九三六年紅軍長征過此地時，朱德總司令和藏族同胞五世格達活佛有過深厚友誼。紅軍憑其秋毫無犯，服務藏民，贏得格達活佛的信任，令紅軍能獲得當地的支持，由糧食到禦寒被服棉衣，藏族同胞都踴躍支持。紅軍也為藏族同胞成立自己的政府，幫助他們掙脫原有舊社會的壓迫和剝削。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即使在生死存亡關頭時，仍然不忘初心，為同胞的福祉而努力。其實真正的革命者是胸懷天下，不計身處逆境，仍以天下百姓福祉為己任。

第三處是四川阿壩羌族藏族自治州馬爾康市的卓克基土司官寨，一九三五年七月紅軍長征途經卓克基，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曾在此暫住。一九三六年原官寨被焚毀，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土司索觀瀛在原址重建。官寨是早期的卓克基土司衙門所在地，位於海拔約二千七百米處，建築坐東北朝西南，居高臨下，據險而守。

（西藏篇十五）